

論語辨惑(八)

蕭民元著

顧毓琇題

時年九六



第十二章 顏淵

第十節

子張問崇德、辨惑。子曰：「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；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」

一般解釋都沒錯。不過，或許有人覺得奇怪，子張問「辨惑」，孔子怎麼回答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等語。各位讀者要知道，我們現在很多用語，例如「感情用事」等等，在孔子那時還沒有這種用法呢。孔子的回答就是說，如果感情用事，靈台就會不清晰，這是「惑」的由來。遇事能夠客觀冷靜，自然就不惑了。

本節與本章後面樊遲問辨惑，孔子說：「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親」是一樣的道理，特此補充。

另外，本章最後，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」八個字，自古以來就有人懷疑是錯簡，（那時沒有發明紙張，文字寫在竹簡上，竹簡排錯了位置就叫錯簡）不應被排在本章之後。我個人非常同意，故不錄上也不解釋。

第十四章 憲問

第一節

憲問恥。子曰：「邦有道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。」

很多解釋都引伸朱熹的話，在最後加了一個「不能獨善其身，是可恥的事。」我覺得沒有必要。

整節的意思很簡單，就是：孔子弟子原憲請問孔子怎樣算可恥。孔子回答說：「一個做官的人，在邦有道時，只會吃俸祿（不會做事），邦無道時，也只會吃俸祿，這就是可恥。」

孔子回答問題，幾乎全有針對性。本節有可能是孔子暗示原憲，說他做得不夠，還要再努力。

（原憲是孔子的弟子，他是一個很特殊，很有個性的人。他小孔子二十六歲，曾當過孔子的家宰。孔子給他俸祿九百斛，他嫌多了，推辭不要。後來，聽到孔子「邦有道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」的訓示，乃因自己有獨行君子的情懷，認為自己不能適合仕途，所以決定不仕。終其一生甘心過著不厭糟糠，匿於窮巷的清貧生活。）

第十四章 憲 問

第六節

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：「羿善射，臯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」夫子不答。南宮适出，子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

本節其實很單純，但朱熹卻說：「南宮适把羿、臯比喻當時權臣，把禹、稷比喻孔子，所以孔子不回答。」這就有問題了。我也因此不得不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。

我以為是，南宮适問孔子說：「羿與臯以力服人，一個有射日之勇，一個有盪舟之霸，最後不得好死。而禹與稷以德服人。一個躬勞治水，一個辛勤教稼，最後卻擁有天下。」這話雖說是「問」，實際並非在「問」問題。而是南宮适向孔子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孔子深以為然，所以也用不著去回答什麼。

在這裡有一種可能，就是孔子弟子對孔子十分尊敬。看到南宮适來見孔子，態度恭謹，就以爲是來請益的。乃把南宮适的「談話」誤以爲「問話」。所以不見孔子回答。

總之，在高水準的賢人談話中，賢人與賢人之間，往往一兩句話就夠了。一兩句話就可以取得高度的默契。這點很像後來禪門裡悟了的人一樣，他只要聽你說一兩句話，就知你是否已達開悟的境界。故而南宮适走後，孔子忍不住大讚南宮适，說：「君子哉斯人！尚德哉斯人！」其理在此。

第十四章 憲 問

第三十一節

子貢方人，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！我則不暇。」

子貢方人，就是說子貢喜歡對別人品長論短。孔子既然看到子貢喜歡對別人品長論短，怎麼還會說子貢「賢乎哉！」所以歷來的解釋，總是弄得歪七扭八的。

我以為這個「賢」字，根本就是一個音誤字，正字應該是「閒」，就是「有空閒」的意思。

總說本節，就是：孔子看到子貢喜歡評論別人，就對子貢幽默的說：「賜呀！你真有空啊！（有時間可以談這些），我卻忙得很呢！」寫到此，不禁擱筆三嘆。我真不明白，宋明的那些讀書人的腦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。例如〈子罕〉章中，說孔子罕言「仁」。孔子明明說得最多的就是「仁」，為什麼腦筋硬是轉不過來，硬要說「仁之道大，故夫子罕言之」。又例如本章，「賢」是「閒」的音誤，再明白也不過了，為什麼就是看不出來？其它種種不合情理的解釋，簡直不勝枚舉。如果說我比他們都聰明，那是絕無可能的事。那麼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！這種奇怪的迂曲現象一定得有個「根由」才行。但願有一天，有人能同意這個看法，願意出來找出這個根由，那就功德無量了。

目前僅就我知道的來說，我發現儒家的精神，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層次或時期。第一個，也就是真正稱得上「博大精深，高明圓融」的「原始儒學」，它代表著孔子及其弟子們還活在世上的那個時期。第二個是從子思，孟子開始，其間經過大儒董仲舒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逐漸下降到宋元明清，屬於「逐漸扭曲」到「十足迂曲」的時期。

在第一個層次中，如果夠冷靜、夠客觀，將不難發現「原始儒家」的本來面目。它是生動活潑，既高明而又不離現實人生的。它算得上是人類文化史中的瑰寶。它所闡發的精神和義理，對於今世人類所面臨的深層內心迷茫和危機感，可以產生極大程度的照明和紓解作用。

第二個層次，就我個人的理解，從子思開始，就有「扭曲」的端倪。在子思的《中庸》後一段，曾大加讚揚聖人或聖德。例如「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！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；」及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，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悅；」。事實上這種「聖人」或「聖德」在這顆星球（地球）上是不存在的。子思是大思想家，他寫的「聖人」，是「理論上」的最高點。而原始儒學所推行的是一種「可實踐」的實踐哲學。理論上的最高點，對儒者來說，猶

之乎北極星之與航海家，是用來校定方位的。而不是一定要達成的目標。例如孔子說：「聖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斯可矣。善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有恆者斯可矣」就充分反映出這個事實。而後世儒者如宋明理學之流，天天把聖人掛在嘴上講，要求人人學聖人，希望人人成聖人，在精神上可說已經脫離了實際人生。這種要求和希望所架構出的理論，已經跨過了實際人生的可實踐性，等於在那裡講空話。所以就因果關係來說，子思的過分強調而形成的聖人概念，或者算是一條根由吧。

至於孟子，說起來他是儒家衛道的第一大將，一生提倡仁義不餘遺力，建樹頗多。但孔子一生不犯的「意、必、固、我」，孟子幾乎全有。孔子曾經讚揚過的賢人，如伯夷、叔齊、管仲、晏子，到了孟子的口裡，難得有完整的時候。他把孔子中性的仁道精神給「極化」了。對天下重大的問題，總是開出「仁義」一味藥方，以為只要推行仁義就可解決一切問題似的。結果使得孔門中寶貴的「可實踐性」變成了「不便實踐之」。例如梁惠王問他「利國之道」。他卻劈頭回答說：「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這種公義和私德不分，急緩不明的想法，處於戰國那個混亂時期，哪裡能夠安邦強國？更糟的是，他的「浩然正氣」加上自居仁義的精神，使他對別派的學說肆意攻擊。這對後世儒學也產生了極其惡劣的榜樣作用。（想來後世把「攻乎異端」誤解為「攻擊異端邪學」，就是承襲了這種精神。）

就事而論，本來孟子只是眾多大儒中的一個。他說什麼，只代表他個人的想法，照理應是無傷大雅之事。但遺憾的是，宋朝理學家把他大力捧出來，到元代時，更把他尊為「亞聖」。這個「亞聖」的精神，從宋到清，在文化思想界發揮了難以想像的影響力。故而我想後世「迂曲」的根，有一支應算得上是由這個「遺憾事件」中滋生出來的。

至於董仲舒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，當然算是主根，但這筆帳卻不能直接地算到他的頭上。因為先秦戰國那個時代，學術思想正處於蓬勃的發展期。展現了「百家爭鳴，百花齊放」的盛況。到了漢帝國成立，對於這個統一的大帝國而言，在體制上不能不從眾派中，選出一個比較精深博大而又中正和平的學說來，做為大帝國的立國思想主流。這是時政的需要，不能全然責怪董仲舒。但不可諱言，這個獨尊儒術的舉措，確實給後世帶來了極大的弊端。不過我們一定得明白，此舉乃「專制」利用了儒學。而不是儒學「創造」了專制。「專制」透過了各種手段，例如科考取士，使人民的思想 and 興趣，局限在有限的空間裡，因而喪失了想像和理解的活力，恐怕才是「迂曲」的本根。

附帶說明一點：記得不久以前，一位對《老子》研究有得的長者，在演說中曾提到：「……中國的專制其來有自，二千年前儒家就製造了專制，所以今天毛澤東的專制，大家應該不會覺得奇怪才對！」這話當然是不中肯的。而存有這種誤會的人，一定不在少數。故而我想再講一次：但願有一天，有一位大德能夠出來，詳細地來做「正本清源的」的工作，我個人願意在此預

先向他頂禮膜拜。

第十四章 憲 問

第四十二節

子擊磬于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「有心哉，擊磬乎！」既而曰：「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子曰：「果哉！末之難矣。」

對本節「：深則厲、淺則揭。」子曰：「果哉，末之難矣！」很多解釋不夠清楚，我想在此盡一份力：

「深則厲、淺則揭」是說過河。水淺時可以揭衣而過，避免打濕衣服。水深時，揭不揭都一樣，一定打濕。這是那個荷蕢的隱士在勸孔子的話。他的意思就是：現在天下混亂有如深水，做得好與做得不好，結果一樣。算了吧！何必在那做無謂的努力呢？孔子聽後乃說道：「果哉，末之難矣！」這意思就是：「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？（淺則揭，深則厲）真是這樣，就好辦了。」言下之意就是不認同那荷蕢的話。（請注意，我們不同意別人的話，有時不必採用否定的方式，這就是一個例子，是一種藝術。）事實上世事雖是客觀的，但如何去面對它則因人而異。全憑各人主觀的認定而加取捨。所以孔子說：「果哉，末之難矣！」只是不同意荷蕢者的觀點，並非否定它。這是必須要聲明的。

其次，孔子很了解自己是那一種人。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堅持推行理念的人。所以他對世事不能像那荷蕢者一樣，簡單而果決的做出取捨。因此，也就變成不好辦了。本章其實很有趣，可以附帶多說明一下：

一、「磬」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打擊樂器，它是由一組大小不同的石片組成。石質是取堅密均勻，可能含有玉質成分的石材。如果懂得「中華文化」而又懂「音」的人，想必會喜歡聲音。因為它聽起來柔和中帶堅硬，有穿透力卻不震耳，很像「君子」的德行。

二、那個荷蕢者顯然是位「高人」。他未必懂得音律，但他可以從磬聲中聽出孔子的心聲。「有心哉，擊磬乎」是他聽出了孔子有「心事」，是一個「有心人」。接著他又聽出孔子力行不懈的精神和內心的寂寞感。所以忍不住說「鄙哉」。

後來有把「鄙」解成「聲音鄙狹」。這是不懂「音」也不懂「情」的話。這個「鄙哉」是那荷蕢者看到孔子如此這般的情形而說的嘆息語。那意思就是「你真差勁呀！怎麼這樣想不開呀！」的意思。有點可憐痛惜孔子的味道在內。

三、由於那個荷蕢者是個「高人」，他可以聽出孔子的心聲，這也反證出孔子在音樂方面也算「高手」。大凡有高造詣的

藝術家，都可以把他們的心靈直接而明顯地投射在他的藝術上。不論繪畫、書法、彫刻、建築、作曲、演奏等等都是如此。

第十五章 衛靈公

第二十五節

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有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」

本節算是斷章，因寫者未把談話背景寫出。不加背景不好解，現假設一下：

有人問孔子，古時候有沒有人無條件把自己利益讓給別人的。孔子回答說：「史料中沒記得有。但我對史料不足或存疑的領域曾經搜索過。我聽過一個把自己的馬讓別人騎（可能是讓給老弱或體力不足的人）而自己卻用腳來走路的故事。這種富有同情心，無條件幫助別人的事，今天是不容易看得到了。」

第十六章 季氏

第六節

孔子曰：「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，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。」

我認爲「侍于君子有三愆」多了一個「子」字，應該是「侍于君有三愆」。很明顯，文中所說的謹慎態度，應該是面對國君時才有。君子是溫和的，不致那樣嚴厲。

由於一字之差，解釋完全不同，現試著重新解釋如下：

孔子說：侍君進言要注意三個容易出問題的地方：

一、「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」：進言不可能達到效果之時就不要說。說了就是「躁」。

二、「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」：應該說，說了就有用的時候卻不說，就叫「隱」。

三、「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」：進言時不看君的臉色，不管場合氣氛對不對就說；等於犯了瞎眼病，就叫「瞽」。

總結這三句話就是：做臣子的向國君進言時（現在也可延伸到下級向上級進言時），一定要注意「時機」的藝術性。否則，不但達不到進言的效果，弄不好還會倒霉。（下期續完）